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传统精髓·现代表达

提问商子

矢志变革
法家英豪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奋勇前行、矢志变革的
商鞅一生充满传奇和
悲情色彩，
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上海人民出版社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商子

矢志变革
法家英豪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问商子/郭志坤,陈雪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提问诸子丛书/黄坤明主编)

ISBN 978-7-208-14250-3

I. ①提… II. ①郭… ②陈… III. ①商鞅(前395年—前338年)—人物研究 IV. ①B22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131号

出版统筹 孙瑜
责任编辑 顾雷
装帧设计 范昊如

· 提问诸子丛书 ·

黄坤明 主编

提 问 商 子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9.75 插页 4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50-3/B·1231

定价 58.00元

总 序

黄坤明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

“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2010年春于杭州

前言

商鞅其人，无疑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依靠明君秦孝公的支持，在秦这块土地，带领秦国百姓出演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变革剧，一度在秦国出现了“妇人婴儿皆言商鞅之法”（《战国策·秦策》）的壮观场景。正是这一场伟大的变法运动，把一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戎蛮之国”，建设成为大大走在山东诸国前头的“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的富国、强国。商鞅死后百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一些史学家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这应该是不争的史实吧！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官。然而，历史的公正需要时日的考验，这种考验常常会长达千年，乃至更久。自太史公司马迁裁定商鞅“少恩”、“天资刻薄人”以来的两千余年间，其人“一直蒙恶名于后世”（章太炎语）。两千年间，言其滥用严刑峻法者有之，言其开人君纵恣专横霸道之统者有之，言其发明告奸连坐法实施法西斯统治者有之，言其“轻罪重罚”弄得人人自危者有之。这样一来，“学者耻言商鞅”，“商鞅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苏轼：《论商鞅》）这些批评当然不全是空穴来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非议也反映了商鞅理论的某些致命缺陷。但是，历史最忌的是以偏概全。如果以商鞅的某些缺陷来概括和统领其人，把商鞅彻底妖魔化，那既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和公正，又难以向商鞅的历史亡灵做出交代。

现在是到了该对商鞅这样巨功与显恶同在的复合型人物，做出公正而切合实际的评述的时候了。好在有由商鞅及其后学共同编定的《商君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悲喜人生	1
第二章 矢志变法	35
第三章 农战为本	65
第四章 修政作壹	107
第五章 千秋功罪	131
后 记	147



第一章

悲喜人生

商鞅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如果把他一生的传奇故事实录下来，那肯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让后世的人们为之动容。

商鞅一生的传奇色彩可以用“悲喜交集”四字来加以概括。商鞅生活在千载一时的大变革时代，前有吴起、李悝这样一些杰出的法家先驱，并世的有孟子这样的“善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大家，稍后便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商鞅生逢变法迭起的大时代。身为这样一个大时代骄子，岂不可喜？商鞅作为一个变法志士，西入秦地，恰遇同样胸怀变革之志的孝公，志同道合，鼎力相助，破除重重险阻，在秦国实施了一系列变法举措，岂不是喜上加喜？

然而，商鞅的人生历程又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前进的历程中，每一步都有阻障和重压。“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的刑太子师，进而加刑于秦公子，都为其“车裂以徇”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悲愤、悲凉、悲壮，一直伴随着商鞅变法事业的全过程。

我们知道，您的母国是卫国，您与卫国的公室也算是一家人了。卫国是西周初分封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诸侯国，第一任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定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后来迁都到楚丘（河南滑县）。在这个国家存在的近千年时间，卫国一共传了三十五个国君。到您商鞅生存的那个年代，卫国已经沦为三等小国，与强大的魏国有着某种臣属的关系。史书记载说：“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这些我们都是清楚的。后来读《史记·商鞅列传》，太史公一开头就在文中介绍说：“商鞅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我们对何谓“庶孽公子”了解不够，请明示，可以吗？

商鞅：正像你们了解的，我出生时卫国已很不景气。但是，正如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我的祖父是卫慎公。慎公当政四十二年卒后，由他立为太子的一个儿子继位，那就是卫声公。声公即位十一年后死去，由他的儿子继位，那就是卫成侯。我当与卫成侯同辈。“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我与卫成侯同为慎公的孙辈。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说一说“庶孽公子”这个称谓了。作为侯国的国君，当然是妻妾成群的了。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数，正宫生的儿子，称为嫡子，而妃妾生的儿子，名为庶子，也有称为庶孽子的。《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庶孽，众贱子，犹树之有孽生也。”树有主干，有分孽枝。正室之子如树之主干，妃妾之子如树之分孽。国君的正宫生的儿子，直称公子，一般而言太子（国王接班人）是在若干位公子中选立的，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应由嫡长子充任太子的，除非长公子有过或夭亡则另选他人。而妃妾生的儿子像树上的分孽枝一样，是“贱”一等的，故称“庶孽公子”。我是卫声公众多妃妾所生公子中的一个，由是被称为“卫之诸庶孽公子”。

《春秋公羊传》书影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高。该传起初只是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中保存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史料。



太史公在《史记》中时而称您为“卫鞅”，时而又称您为“公孙鞅”，您究竟是姓“卫”，还是姓“公孙”呢？查《仪礼·丧服》，上面的说法是：“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可是，上面说到您的祖父卫慎公从地位上说已降为“小侯”，已算不上是诸侯了，为何仍以“公孙”称之呢？有学者以为那是司马迁的一个误称，另有一些学者为了使“公孙”之姓名正言顺地成立，还与有些史籍上说的“公孙氏”是黄帝一脉拉扯上关系，说您实际上是黄帝子孙。这样的众说纷纭，倒使人莫衷一是了。先生，您是当事人，您以为何种说法较为合理呢？



司马迁像

商鞅：卫国到慎公时期，的确已经降为屈从于强大诸侯国的小侯，难以用诸侯名之了，事实上当时的诸侯之盟会也早已不邀卫国君参加了。上面引述的《仪礼·丧服》上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随着时日的迁移，人们的观念在变。初始时，“公孙”的确严格地指的是诸侯之孙，后来就大大泛化了，凡是贵族后裔而又在社会上声名卓著的，人们会称之为“公孙”。这既是尊崇，又是客礼。可见，说我

姓卫，称为卫鞅是可以。同时，说我姓公孙，称我为公孙鞅，也是可以的。公孙鞅是人们对这个有作为的“庶孽公子”的尊称，而卫鞅当是一种实称。有些学者说公孙是黄帝一脉的姓氏，因此又把我与黄帝后裔拉扯在一起，虽说是远了些，但也是事实，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仪礼》书影

还有一个问题，也一并在这里问了吧，除了上述两种称谓外，现在为何人们又称您为商鞅呢？为何总是说“商鞅变法”，而不称“卫鞅变法”呢？难道“商鞅”这个名号是非得与“变法”挂钩在一起的吗？



商鞅：说对了，商鞅这个名号完全是变法的

产物。“商”是我商鞅入秦以后实施变法取得很大成效后获取的姓。“（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又带领大军打败了强敌魏国。在这种情况下，“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是当年周天子封的古国（河南商洛县一带），地盘不大，但位置相当的重要。商君的“君”，是一种尊称。《礼仪》：“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把这时的我称为“商君”，既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又是以其封地为依托的（按古制，没有一定封地，声誉再高也不能以“君”名之）。中国历来有以封地为姓的传统的，后人以我被封的“商”地为我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郑玄像

郑玄，东汉末年轻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尊称商鞅为“商君”。

商鞅雕像（商鞅广场）



知道了您的姓名以后，我们还很想知道您的生卒时间。您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常常模模糊糊，比如墨子、老子、庄子等，都很难有确切的生存时间可界定，据我们所知，您也存在那样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是依据某历史人物的某一坐标式的事件，再通过合理的推导，大致地勾勒出人物的生平行状的。请问：在您的一生中，有哪些确定无疑的坐标式的事件呢？



钱穆像

商鞅：我的生年虽然有点模糊，但我的卒年以及我的重要行踪的年代都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都有坐标式的事件可资佐证。这一点我比老子、庄子等要清晰得多。比如，我入秦的年份，那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秦孝公颁发《求贤令》的那年。秦孝公颁发《求贤令》史书上明确标明是在孝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孝公在位二十四年，死的那年是公元前338年，就在那一年，我被新登位的秦惠文王处死。

有了入秦和死亡这两个时间坐标，我的一生的生命历程也就可以较为精确地加以匡算了。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商鞅考》中认为，如果假定我入秦时是三十岁，那么我该是生于公元前390年的。这个设定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一生是活了五十二岁的。这一设定受到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首肯，简直可以说是成了一种共识。我也认为那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钱穆作的《先秦诸子系年》
书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说到商鞅的生年大致上可定为公元前390年，突然在我们的脑际跳出另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学者也大致上考定其生于公元前390年。两人真可说是当时并世的思想界两颗巨星了。可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人一生于鲁国的邹地，一生于卫国的王城，可说是毗邻而居了；两人后来都到过魏国，接触的是同一个魏惠王（即梁惠王），可是，在您的煌煌巨著《商君书》中，为何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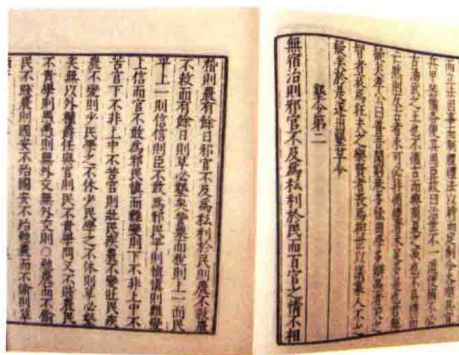
商鞅：这一问问得好，问到了点子上了。从中可以窥见我的变法学说的特征。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的《商君书》中，不只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对其他的所谓诸子我也大都不着一笔。为何那样？就是因为我根本上反对学者之间的无休无止的辩论，尤其是反对孔孟儒家之徒的那一套。我在《商君书》中多次表明了观点。我在《垦令》篇中写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我认为，孟子这些人到处与人“辩慧”，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到处“游居”说事，我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皆无得为。”就是你自以为是在“作为”，实际上是根本“无得为”，我认为就是“为”了，也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在《农战》篇中，我更尖锐地指出：“务学《书》《诗》……民以此教者，其国必削。”在这里我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等学者的诗书礼仪之教，那么，我对并世的孟子等人的不着一笔也就不难理解了。

《商君书·垦令》书影

此篇共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法令二十条；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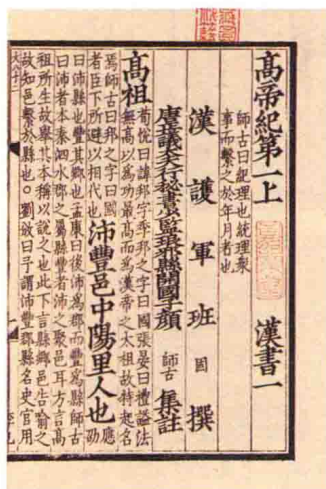
《商君书》书影





班固像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他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又说商鞅是“衰周之凶人”（《汉书·叙传上》）。



《汉书》书影

《汉书》，又称《前汉书》，为班固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刑法志》说：“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这样就使不少人对于商鞅的印象就是一个酷吏。

您一生只活了五十来岁，就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只能算是“中寿”。您用这有限的寿数，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一番大事业，这是令人敬仰的。可是，班固等人又说您是“衰周之凶人”，语带讥刺之意。如果要您对自己的一生作回顾的话，能不能概括出若干的阶段来？

商鞅：已经有学者给我作过大概的概括了，称之为“商君人生十步曲”，我想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这十步曲是：第一步是“少好刑名之学”，这是人生迈出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在魏国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初步显示了我的才华；第三步是毅然“西入秦”，求见正在“求贤者”的秦孝公；第四步是舌战群臣，“定变法之令”，实施第一次变法；第五步是“立木取信”，争取广大民众支持；第六步是严惩违法者，积极推进变法；第七步是孝公封我为“大良造”，给予更大权力。迁都咸阳，实施第二次变法；第八步是以计大败魏军，孝公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事业达到顶峰；第九步是应答赵良批评，对其劝阻表示不能接受，决然涉险前行，将改革事业进行下去；第十步是孝公亡，公子虔“发吏捕商君”，“车裂商君以徇”。

这人生十步曲，蕴含着的是“悲”“喜”两字。其中有大悲，有大喜，亦有大悲与大喜的交织。不管是“悲”也好，“喜”也罢，都是与我执著变法矢志不渝的品性相符合的，因此，不管后人怎么评说我（特别是包括班固在《汉书》中对我的批评），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这一生过得值！

您人生的第一步是为日后的事业打下思想和学业上的基础。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您是“少好刑名之学”,而后世不少学者又认为您不仅“好”刑名之学,对于黄老之学、儒学,以至于会通诸子百家的杂家之学都有所“好”,简直是广有所“好”,您说呢?

商鞅:我同意“广有所好”说。在那样一个千帆竞发、群雄蜂起的大变革时代,单是掌握某种单一的学问,是难以自立于世的。有所侧重可以,但决不能单一。我的广有所好,在一些历史资料和一些学者的评述中也有所提及。著名学者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明确指出:“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有所涉猎”的提法好,不是什么都专精,而是都触及了,可以说我是个博学者。

较多的学者认同,我曾向鲁国人尸佼学习过。尸佼可能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颇有地位的学者,也有著作传世,后来不知何因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连身世都难以追寻。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似乎相当普遍。《汉书·艺文志》将《尸子二十篇》列于杂家类,而杂家的特色正是“兼儒墨,合名法”。我向这样一个博学者学习,受益是很大的。后来我在会见秦孝公时,我既说以帝道、王道,又说以霸道、强国之道,充分反映了我刺取百家的本色,也可见我学问根蒂之深之广。如果读者诸君愿意去读一读我的《商君书》(原为26篇,现存24篇),那可以看出,我的许多主张都是霸王道杂而有之的。当然,在我所学之中,还是以法家学说为主,也就是司马迁说的“鞅少好刑名之学”。我什么都“好”,但“好”中特好的当是刑名之学了。



《秦史稿》书影

林剑鸣,著名秦汉史专家。著有《秦史稿》《秦汉史》《简牍概述》《秦国发展史》等,他认为商鞅知识广博,吸纳了先秦诸子各家思想。



《尸子》书影

尸佼,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他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尸子》中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沿用至今的“时空”概念。

商君书

我们听懂了。说您在学习中单科独进是不当的，说您各科齐头并进也是不妥的。在学习的总体系统中，有一门主科，那就是您在《商君书》里所说的“刑名之学”。先生，您能否对这门学问给我们作一点解说？

《商君书》书影(中华书局出版)

商鞅：当然是可以的。刑名之学，相传脱胎于黄老之学。“刑”，通“形”。也就是强调事物的“名”，要与事物的“形”相匹配，不能名不符实。后来，战国时的申不害、李悝一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把“刑”与“名”用于经济生活、军事生活以至于政治生活，这样，刑名就更多的具有“法”的意味了。我学习的正是这一学说，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法家学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这是我长期学习刑名之学后得出的终极结论。



老子像



庄子像

通过学习,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才学后,您就选择了同孔老先生那样出游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通行的一种学习和实践方式,称为“游学”。这次游学您选定在魏国,那是什么道理?这次游学对您来说收获大吗?



商鞅: 我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大约是二十多

岁的时候。那时,卫国国内乱得很,公室之间争权夺利。作为一个“庶孽公子”来说,留居在母国有百弊而无一利,什么时候如果卷入到利益争斗的旋涡之中,那死无葬身之地也是说不定的。我得赶快走。哪里去好呢?我选择了魏国。首先是因为卫、魏是相邻的国家,路途上比较方便。更主要的是魏国在当时是一个大国、富国、强国,刑名之学比较盛行,我到那里去可以把原先学得的刑名之学的理论与魏国刑名之学的实践结合起来。要知道,魏国可是著名的法学家李悝推行刑名之学的实验基地啊!

孔子像

此为明代绢本笔绘孔子像。画中孔子眼睛传神,系孔子退朝而处的形象。



孔子的周游列国,影响了数代人,当然也影响了商鞅